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苏联经济论战中的 政治潜流

——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

〔英〕莫舍·卢因著

倪李铨 张多一 王复加译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

——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

〔英〕莫舍·卢因 著

倪孝铨 张多一 王复加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3年·北京

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

——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

〔英〕莫舍·卢因著

倪孝铨 张多一 王复加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10 1/2印张 字数：285（千）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500

统一书号：30220·4 定价：1.10 元

（内部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内 容 简 介

英国莫舍·卢因著《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一书于1975年由伦敦普卢多有限公司出版。书中主要介绍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形成经过和当代苏联经济学界讨论经济改革的情况，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现状进行了剖析。

关于二十年代的争论

作者说，斯大林奉行“原始积累”理论，用剥夺农村和牺牲消费品生产的办法来维持高得惊人的积累率。斯大林提出的口号是“速度决定一切”。斯大林经济纲领的指导方针是“解放”生产力，其核心是最大限度地对重工业投资。斯大林根本不考虑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和平衡。相反，把一切不符合自己胃口的经济主张都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异端邪说”。结果，他在取消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用高压手段于三十年代建立起一种特殊的经济模式——“由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官僚机构所管理的完全或几乎完全国有化的”“中央统制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在决定经济政策和制定经济计划方面实行高度集中化；对物资供应实行集中化的行政管理，即实行定量配给制度；计划内容无所不包并且是强制性的；崇拜数量指标；把市场范畴和市场机制降到次要地位，而且仅仅把它们看作是对个人消费领域和劳动领域起作用的东西；企业内部存在等级森严的行政管理体系等等。在这种经济体制基础上，产生了相应的权力关系，即“把整个制度变成一种特殊的党国的政治体制”。

这种特殊模式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出现了机能越来越失调的现象并由此而导致了一连串阻碍经济发展的倾向，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于苏联的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

作者指出，布哈林和斯大林虽然曾在新经济政策、农民和工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相似，但他们很快又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成了对立面。布哈林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新经济政策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是苏联继续实行工业化的长期背景和基础，其理论根据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总的来说不会变得越来越激烈，而是会慢慢消失，因此苏维埃政权不需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它所采取的政策应当是“渐进的”和“有节制的”，而决不当用“大规模的镇压手段”来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认为，从长远来说，城市和农村中的私有经济成分要被取消，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由一个无所不包的国营经济成分来取代它，企业主阶级将会被消灭，但应当通过效率更高的社会主义的国营和合作社企业在市场上赢得胜利的办法来实现。他反对一举压垮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小业主和小农产品生产者，认为他们所代表的经济成分是对整个工业化的一种补充。布哈林强调市场应当成为经济的决定性形式，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容易导致官僚主义化和低效率，产生“垄断的腐化作用”，而市场竞争则是防止产生这些弊病的有效办法。

布哈林认为把农民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虽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对农民采取某种程度的强制性措施是不可避免的，但从根本上来说必须同农民进行合作，允许农民发展，甚至允许农民中间出现某种程度的阶级分化现象，只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积极扩大就行。布哈林反对“速度决定一切”，而主张长期持续增长；强调经济要按比例发展和计划要保持平衡，反对最大限度地对重工业投资而置农业和轻工业于不顾的片面性；主张充分利用市场和范畴，把经济的计划性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作者说，由于斯大林用镇压的办法压制了布哈林这些正确主张，结果给苏联的经济和整个政治生活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关于苏联当代经济学界的辩论

作者说，苏联当代经济学界就经济和经济改革问题进行的争论是在五十年代末苏联经济增长率突然下降、过去使用的经济战略显然妨碍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开始的。这场争论于六十年代进入高潮，七十年代仍在继续进行。争论的结果，有两个思想被人们广泛接受：一是市场并非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一是必须在中央计划和市场社会主义之间找出某种新的关系。自新经济政策时期以来，中央集权化第一次不被人们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信条。大多数人虽然未对计划和中央统制提出异议，但他们认为，这种过分由上而下集中计划和下面缺乏计划性的经济体制，必然产生只顾完成数量指标、忽视质量和压制革新等现象。也有一些人对计划和中央统制本身进行抨击。如著名飞机设计师安东诺夫认为，“死板的计划指标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十分严重的、令人不能容忍的损害”，它使工人以一种浪费的、甚至是犯罪的方式进行生产。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指出，“如此从上到下被束缚起来的一种体制，将对社会和技术进步起阻碍作用，它迟早要在经济生活实际进程的压力下土崩瓦解”。

作者介绍了苏联现代经济改革派提出的一些主张。例如，涅姆钦诺夫主张计划要利用市场的作用，并为直接生产者提供必要的自主权和物质刺激。另一些数理经济学家要求进行彻底改革，认为束缚工厂手脚、压制它们自由行事的能力是现存管理体制最严重的缺陷，主张高级行政机关、各个部成为“成本核算单位”，直接为其领导下的企业盈亏负责；强调计划、中央经济管理部门和工厂的关系以“经济杠杆”而不是直接命令为基础；提出企业应受计划指标的强有力影响，但其日常活动应为消费者、而不是为计划服务，计划只确定利润或效率等指标，不应包括产量指标。有些改革派认为，计划的作用在于“调节”而不是“管理”经济，应当重新组织社会主义市场，使大部分投入和产出（其中包括资本货物）都自由流通。

作者写道，1965年苏联在柯西金主持下进行了经济改革。但在以后几年里，反对改革的力量不断增强，认为改革派要求自主权和对中央与地方关系重下定义的做法无异于产生了一种新的势力。许多当权人担心，改革如继续进行下去，将会毁掉统治集团和整个官僚体制，因此竭力强调改革只能以加强中央集权为前提。

作者还介绍了苏联现代经济改革派对现存国家制度的批判。说有些改革派认为现行的行政管理办法直接依靠的不是人们的经济利益，而是政府的权威。他们认为，如果无视经济规律，中央集权制就成了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当前的政府和领导人不仅代表“全体的利益”，而且也发展了自身的利益。因此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重新确定其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找出使国家不致进行过分干涉的办法。

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

作者写道，目前苏联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已经城市化和工业化了，政治制度中原有的许多特征亦已发生变化；同斯大林时期相比较，在管理国家的方式方法上出现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和改造，但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那些准则，今天仍然存在于苏联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党的生活中。许多苏联人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支配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那些制度不适应，是目前苏联到处存在紧张局面和出现并继续存在改革倾向和持不同政见倾向的原因。苏联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并承认感到为难。这个事实本身就是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新的现象，其证明是至少五十年代中期以前还被当作反动的东西而遭禁止的若干社会科学学科现在又得到了提倡。

作者对当前苏联党内外各种政治趋势进行了分析。说目前的领导集团竭力要维持现状，推迟或阻止改革，除非改革会带来安定的、不破坏现状的经济增长。在苏联，权力集中在最上层，下面各

官僚等级和普通群众只有义务绝对服从和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苏联在经济领域中的国有化是靠剥夺直接生产者的各种权利实现的；同样，政治生活“国有化”的现象也是靠剥夺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形成的。作者认为，今天苏联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是社会的不平等和阶级关系紧张，这已成为苏联领导人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苏联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作用在下降，党员和老百姓普遍对政治抱漠然态度，“没有人主动地相信党的话”。面对这种情况，党试图加强自己的控制能力，但收获甚微。作者说，如果认为苏联领导集团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是不对的，这个制度目前“显然还处在成功的极盛时期”，只不过有了一些动荡不安的趋势，显得有点运转失灵和出现某些危险的裂痕罢了。

导 言

大约四十年前，苏联开始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从那时以来，它的社会和政治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使在斯大林死后的很短时间内，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尽管它还保留着一个庞大的农业经济部门，相对不发达状态还依然存在，但它的经济、社会结构，现在则已经城市化和工业化了。政治制度中原有的许多特征也起了变化，同斯大林时期相比，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有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

然而，无论社会生活发生了多少引人注目的变化，斯大林当权时建立并遗留下来的那些制度（有些建立得更早），至今还盘踞在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之中，在举足轻重的执政党内部，则更是如此。

许多关心政治的苏联公民都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苏联的社会虽然前进了，但支配国家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那些制度却没有相应地进行调整。这也是本书的基本出发点。从苏联经济学界开展的辩论（即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中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生前和死后，新的社会一直都在向前发展，而政治制度的变革却很缓慢。这种说法如果属实，也可以算作对苏联国情的一种判断，有了这样一个总的看法，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苏联制度内部到处存在着紧张关系，也容易解释为什么在苏联会出现并长期存在改革倾向和持不同政见的倾向。

实际上，许多苏联问题观察家都同意这种判断，也知道这些倾向，但对这些倾向的规模和深度至今还没有定论。历史学家的好处是，事情过去以后，可以很容易准确地指出某些社会中所存在的

“制度不健全”、“关系紧张”、“离经叛道”和“持不同政见”等现象。但是，要分析由一个占据一整块大陆的国家所管理的一个复杂社会中的当前事件，那困难就会大得多。分析苏联的当前事件尤其如此，因为那里的消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难得到，那里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新的，都还处于酝酿状态，对苏联领导人和负责新闻检查的官员自己来说都的确还是陌生的。

苏联上层人物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并且承认感到为难，这个事实本身就是苏联政治生活中一个新的重要现象；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至少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以前还被当作“反动的东西”而遭禁止的若干种社会科学现在得到了提倡。然而，政治学并不包括在官方允许的学科之中，苏联历史也有许多方面的内容仍然受到严格的审查，而这种做法同过去继承下来的思想习惯和统治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如此，从许多方面来说，政治学和历史学这两个学科都是压制不了的。学习和研究政治学的人在苏联是有的，只是不用“政治学”这个名称罢了，其目的有的是为了反对政府，有的则是为政府效劳。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苏联在六十年代，还出现过一股研究历史问题的热潮，许多人热衷于对当时和过去的许多重要生活领域进行分析。不过在某些苏联保安人员看来，研究历史并不会引起什么麻烦。在一个历史不长、但冲突迭起的国家里，由于过去和现在仍然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历史就直接成了政治的一部分，这在某些当权者看来是十分可怕的。与此同时，政治也会涉及历史问题，吸引并迷住许多对本国问题进行研究的人。

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就充满了现在与不远的过去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现象，而这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主题之一。苏联历史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每当我们注视苏联国内某些重要的事态转变或者那里出现的大辩论时，我们都能明显地看到这些事件所起的作用。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苏维埃俄国，文学、历史、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均出现了这种大辩论，每次大辩论都向我们提供了进一步了解苏联的极好机会。就象轻微的地震活动那样，这些辩

论暴露了某些在此之前仍然掩盖着的“地质层”，使人们能够洞察这个社会整个制度的内情。

本书将介绍苏联国内在经济和经济改革问题上的辩论。这些辩论在五十年代末开始，六十年代进入高潮，七十年代初仍在继续进行，但势头已多少不如过去，对问题的分析也不如过去那么深刻。这些辩论是苏联理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伴随并推动了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在苏联的出现，同时证明了苏联一群特定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中间激烈的思想波动。

我们所用的材料来自于苏联经济学家们论述经济理论和讨论苏联日常经济问题的书籍和文章。但是这些辩论中凡属纯专业性的内容（例如某些关于制定价格或制定计划的方法方面的意见正确与否、实际通过的那些经济改革方案的详细内容以及这些经济改革目前的进展情况究竟如何等）则不在本书所研究的范围之内。读者会发现专业经济学家们已经充分地研究过这些问题了。本书集中探讨的是苏联经济学家们在关于经济问题的辩论中所披露出来的苏联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下面这些情况：要求改变经济体制的压力；对许多教条的冲击和这些对教条的修正；在比纯经济学范围大得多的领域里所出现的新的观点和新的思想派别，以及在一群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中间进行的这场辩论所包含的社会、政治与历史意义。批判性的政治思潮的出现与发展、观点发生分歧和变得多元化以及对过去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些都是有关经济问题的辩论所带来的新现象，对此，书中将有介绍。这些现象说明了苏联理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存在的人们迄今尚未充分理解的一个更为普遍的情况：各种各样的政治见解全都努力地影响着各种人群和各个社会阶级，渗透进党的生活，参与政策制订者形成意见的过程并且构成苏联政治现实的一部分。

苏联的文化生活中存在着上述情况，这一点已由研究苏联文化和文学的学者用“地下出版物”的大量作品作为例证而充分加以证实了。实际上，苏联政治生活中铁板一块和呆滞、不活跃的现象是表

面的，其实际情况比表面上显示出来的要丰富多采得多。“地下出版物”的作品中至少有两篇——一篇是阿马利里克写的，另一篇时间稍晚些，出自罗伊·麦德维杰夫之手——提供了对目前存在于苏联党内外各种政治趋势的分析。^①

此外，有关六十年代及其以后的经济辩论的书籍和文章的内容、对苏联这个经济模式过去和现在的效果的评价以及要求进行变革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所有这些在命题和措词上都是同二十年代那些辩论令人吃惊地相似甚至吻合的。随着当前这场论战的展开，人们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场论战充满了暗示、引喻、对别人语录的抄袭、不提出处以及直接和间接地引用二十年代一些知名人物的观点等现象。二十年代的那些知名人物显然同这场论战毫不相干而且早已被人们遗忘了，其中有些人由于在三十年代被枪决而声名狼藉。不难发现在这个拼板玩具中所失去了的那几块“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尼·伊·布哈林——斯大林的最后一个重要反对派的领袖。然而，象他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影响是不会随便得到承认的，这也许是因为受到政治上的限制（今天比在赫鲁晓夫时期限制得更严），也许是因为参加辩论的那些人缺乏政治和历史知识方面的训练，他们有时并不太了解过去同现在的密切关系。

目前的改革派竟会采纳布哈林在 1928 至 1929 年间反斯大林纲领中那么多的观点作为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对过去情况的批判（甚至在语言措词上）竟会同布哈林的批评意见和预言如此吻合，这真是令人惊讶不已。而这一点正是本书开头要论述历史问题，即论述布哈林其人和在他领导下“右派分子”为反对斯大林的政策而开展的那些老的辩论的主要原因。

本书之所以特别提到布哈林所起的作用，是因为他是反对斯大林的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这一点我们将特别予以强调。当然，他

^① A. 阿马利里克：《苏联能生存到 1984 年吗？》（纽约，1970 年版）；罗·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阿姆斯特丹，1972 年版）第 3、第 4 章。法语译本，S. 若弗鲁瓦：《论社会主义民主》（巴黎，1972 年版）。

并不是同反对斯大林的斗争有关联的唯一的领导人，构成他的论据和纲领的那些观点也并不都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但是他是新经济政策的最主要的代言人，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因为维护这个政策的基本精神而进行的斗争是紧密相连的。正是他所起的这种作用解释了他的许多观点，也说明了三十年以后与他的观点相类似的一些观点会再次出现的原因。诚然，三十年以后的情况与当时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但是这个国家现在同样处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作出抉择的重要关头。

布哈林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十分令人感兴趣的人物，直到被斯大林及其一派击败为止，他一直是党的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然而在西方学术界，他却没有象列宁、托洛茨基和后来的斯大林那样引起很大注意。至少有一部分理由是明显的：他比那些人年轻得多，所起的作用肯定比他们小。那些人建立过理论，做过大事，在理论、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显示了多方面的才能。布哈林虽然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一开始组成时就在这两个机构中任职，却从来没有担任过重要的行政或军事职务。他主要是从事于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是一种兼有做学问和搞宣传的工作，意味着他基本上是个搞政治的知识分子。党和列宁把他看作是最年轻、最能干的党的理论家。总的来说他不是个善于党内斗争的人，搞政治策略和计谋不是他的长处，他在这方面的成绩常常是很差的。但他聪明过人，书读得很多，热爱艺术，还是个蝴蝶标本的收藏家。他举止谈吐都极有教养，可以说是个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虽然他那由于道德观念和艺术爱好而形成的瞻前顾后习惯过分地束缚了他身上那种严格意义上说的政治活力，但他在同苏联革命事业中那三个最大的人物——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发生冲突时却是毫不迟疑、甚至往往是不顾一切的。这个事实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所具有的活跃思想和他所达到的道德和精神境界。他对布尔什维克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些理论提出得比列宁早，有些是在同列宁进行争论时提出来的——并且增添了许多有独创性的观点。其中有些观

点生存的时间比他长，今天还在起作用，尽管它们的创始人不为人们所承认。但是，布哈林的形象在西方是暗淡的，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可以从他帮助斯大林击溃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分子这种目光短浅的做法以及后来他自己被斯大林击败这个事实中找到，这些情况使得他以及他的同伙的那些观点显得不足取。难道俄国不是已经变成斯大林所希望的那个样子而没有变成那些被击败了的派别所希望的样子吗？看来正是这个事实作出了裁决。此外，托洛茨基有大量的机会亲自阐述自己的见解，给他写传记的那位有才学的多伊彻后来也（至少在西方文学中）为恢复他在苏联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出了力。

布哈林仍然有待于公正的评价。但是在维辛斯基——对布哈林等人进行捏造事实的审讯的检察官——背后牵线的那个统治者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所起的作用和他的为人已经引起激烈的争论。东欧存在的“自由共产主义”现象、所有东欧国家中进行的经济改革、多中心主义、苏联出现的经济困难、改革和新的思想方法，尤其在许多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新的思想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对在斯大林主持下建立起来的那个制度进行了批判而造成的。所谓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表明当时正在酝酿着对过去的幽灵重新恢复名誉，这场运动起初是悄悄进行的，后来则变成官方的正式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开始出现了苏联历史的重新研究和解释。虽然这一进程现在已被制止，但是作为本书开头的布哈林小传却是依据下述设想写成的：历史上那些党内反对派的活动所涉及的问题同当前的苏联政治舞台仍然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在那些活动中冲锋陷阵的是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中所消灭的所谓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其中首先就是布哈林及其信徒。这种情况表明，“在今天，二十年代的那些观点还远远没有失灵。”^①在苏联，凡是对重要人物的谴责、为其恢复名誉或给予重新评价，总是带有意味深长的政治含义，这已是普

^① 已经到1960年了，A. 厄利奇在他所著的《苏联工业化之争》（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0年版）一书中仍然持有这种看法，见该书前言部分第22页。

通常识。对斯大林的态度便是一个例证。布哈林极有可能是下一个被重新考虑的对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并且这位反对派领袖终于有一天重新得到官方历史的承认，那么更多的人就会重新被提起。

眼下，由于苏联国内政策中保守路线的影响，整个问题看来还被冻结着，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僵持状态。但是在西方，有一本传记已经问世；^①在苏联——如同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有关经济问题的辩论中间接的、遮遮掩掩的或者甚至是完全无心的表态和揭露，皆表明那里正在进行着对过去历史重新评价的活动。

就某些学者尤其是老一辈的学者来说，他们这种重新评价的活动并不是无意识地进行。我个人的经验和我的研究结果均表明，这些经济学家中有些人非常熟悉二十年代学术界和政治界一些主要人物的著作。要不是因为官方的新闻检查或作者的自我检查，在一场激烈的辩论中，许多人的名字（例如巴扎罗夫、格罗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会立刻充满现在这些经济学家所写的文章中的。斯大林是不可避免的吗？布哈林的计划是否有过实施的机会呢？谁能怀疑对研究这些问题深感兴趣的俄国知识分子在这样一场辩论中不会经常采取同官方远为偏离的立场呢？

但是在目前，过去那些主题，包括在许多方面同布哈林的见解非常相似的一些见解竟会重新被人提起，这倒是更加引人注目的，因为对于大多数参加最近这些经济辩论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在对当前的现实生活作出反应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巧合，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发现。这种情况接下去就会导致他们（至少是其中的某些人）对老一辈作者的研究，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同那些作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但是，无论在每一个卷入这场辩论的人的思想上是否都发生了

^① S. 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本政治传记》（纽约，1973年版）。笔者在本书最后定稿时尚未得到S. 科恩的这本书。

上述思维过程，反正题目以及论据的这种巧合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而且当然有着无法反驳的理由可以加以证明。首先，许多令人烦恼的事情、问题和理论，其根子皆可以从苏联在本世纪首创的那两种特定的权力关系中找到，这两种权力关系就是：（1）由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官僚机构所管理的完全或几乎完全国有化的经济；（2）由一个把整个制度变成一种特殊的党国的独一无二的国党所管理的政治体制。从本质上说，二十年代的辩论，尤其是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的争论乃是一场赞成或反对建立这种特殊模式的斗争。布哈林以及和他有相同想法的那些人宁愿把新经济政策的那一套制度看作是继续实行工业化的长期背景和基础，而斯大林周围的那群人则想摆脱新经济政策这个基础而建立——即使他们并没有立即充分认识到自己前进的方向——一种新的制度。过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一场新的辩论开始了，这场辩论仍然跟同一个模式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模式右翼分子和其他一些人在二十年代曾预料并竭力加以防止过，现在他们的继承人又以一种事后的认识注视着并想加以改变。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两次辩论中被评论的对象在许多方面都是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经过长期中断之后，现代的论战看起来好象又回到以前争论过的那些问题上，并且在许多方面经过一番精心设计之后，又继续同新的环境结合在一起了。很显然，在当前情况下，所争论的问题已不再是如何使一个农民国家工业化，而是如何管理好一个庞大的工业国家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社会环境同二十年代的社会环境极不相同，今天参加辩论的人所能获得的分析问题的经验和手段也比二十年代所能提供的要优越。很自然的是，当前这场辩论所涉及的问题当然会超过从前宣传新经济政策的那些人所提出的问题。尽管如此，在这两个不同的时期中，人们在辩论中实际使用的论据却是惊人地巧合的。

希望读者理解，笔者并不想把布哈林理想化或夸大他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笔者以及本书对此均不发生兴趣。本书所探索的现象